

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丛书



民间历史文献与 乡村社会研究

李平亮 等◎著

Minjian Lishi Wenxian Yu
Xiangcun Shehui Yanjiu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民间历史文献与 乡村社会研究

李平亮 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间历史文献与乡村社会研究 / 李平亮等著.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12
(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丛书)

ISBN 978-7-210-07571-4

I. ①民… II. ①李… III. ①乡村—社会变迁—研究—中国 IV. ①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7435号

民间历史文献与乡村社会研究

李平亮 等著

策 划: 游道勤

责任编辑: 陈子欣

封面设计: 同异文化传媒

出 版: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重点图书出版中心电话: 0791-86898683

发行部电话: 0791-86898815

邮 编: 330006

网 址: www.jxp-ph.com

E-mail: swswpublic@sina.com web@jxp-ph.com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70千字

ISBN 978-7-210-07571-4

赣版权登字—01—2017—33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 价: 42.00元

承 印 厂: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族谱编修与乡村政治

房谱的编修及其意义

——以天宝《墨庄刘氏塔下重修房谱》为例 李平亮/3

身份建构与正统争夺：清华胡氏三派竞修统谱的个案研究 廖华生、尹庆玲/20

祖先记忆与文献传播

——“瓦屑坝”三考的来龙去脉 游欢孙/44

鄱阳湖区张氏谱系的建构及其“渔民化”结局

——兼论民国地方史料的“有效性”及“短时段”分析问题 梁洪生/67

宋代以后葛源镇的大族历史与社会变迁 游欢孙/95

宗教文化与社会变迁

清代萍乡许真君信仰的发展与乡村权力格局的演变 李平亮、赵鹏飞/129

地方神庙与社会文化变迁

——南昌西山万寿宫碑刻研究 李平亮/144

苛征、祠祀与地方利益：元代金溪二孝女祠祀研究 吴小红/167

宋元时期龙虎山道士对民间信仰的利用和扶持

——以贵溪自鸣山神为例 吴小红/195

康熙时期庐山的文化建构 杜玉玲/220

《庐山太平兴国宫采访真君事实》与《太平宫志》考实 杜玉玲/234

鄱阳湖文献与城乡社会

捕捞权的争夺：“私业”、“官河”与“习惯”

——对鄱阳湖区渔民历史文书的解读 梁洪生/245

明清时期鄱阳湖区河湖之演变

——以赣抚河口平原为中心 晏雪平/273

历史时期南昌城排水系统及其变迁

——兼及南昌城及周边河湖的演变 晏雪平/292

论民国以来鄱阳湖区的水利纠纷 吴 贇/305

“农进渔退”：20世纪50—80年代鄱阳湖区的草洲纠纷 吴 贇/313

族谱编修与乡村政治 >>>



房谱的编修及其意义

——以天宝《墨庄刘氏堦下重修房谱》为例^{*}

李平亮

族谱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历来就受到治史者的关注。尤其是从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史学研究的转型和社会经济史的兴起，族谱成为众多史学研究者了解明清以来地方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史料之一。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或是从谱牒学的角度，对族谱编纂的体例以及纂修者的指导思想进行分析和论述，或是围绕某个主题，引用族谱中的相关史料，进行阐述和论证，忽视了族谱编纂背后的社会性和文化性。近年来，一些学者将族谱放回具体的历史场景，通过对其文本生产及流变的历史考察，展示了族谱编修背后的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变迁的互动过程。^①但是，学界对于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以来华南族谱编修过程中从族谱到

^{*} 该谱为2009年8月笔者与梁洪生、吴小红、游欢孙、刘飞华等人在村庄进行田野考察时所获，在此也向他们表示感谢。另外，此次考察也得到了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9czs031）的资助。

^① 刘志伟《从乡豪历史到士人记忆——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明代地方权势的转变》，《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祖先谱系的重构及其意义——珠江三角洲的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宗法、户籍与宗族——以大埔茶阳〈饶氏族谱〉为中心的讨论》，《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6期。梁洪生《辛亥前后江西谱论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0年第2卷；《谁在修谱》，《东方》，1995年第3期。钱杭《谁在看谱》，收入上海图书馆编《中华谱牒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郑振满、张侃《培田》，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日〕濑川昌久《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

房谱的转变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讨论得并不多。事实上，作为一种民间历史文献，房谱的产生既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地域环境，又是明清时期社会结构和宗法观念长期演变的结果。因此，对从族谱到房谱这一转变的考察，不仅有助于厘清族谱这种民间历史文献的发展脉络，还能进一步揭示族谱生产的社会机制与文化意义。本文试图以江西新昌县（今宜丰县）天宝乡《墨庄刘氏堦下重修房谱》为例，考察从族谱编修到房谱编修的转变，以及房谱内各种文本产生的历史过程，分析房谱的编修与家族结构转型的内在关联，揭示房谱编修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不足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 从族谱到房谱

天宝乡位于新昌县的北部，距离县城约九十里，与南昌府奉新、义宁二州县交界，是新昌通往湖广地区的必经之地。该乡四面环山，东南为洞山，西南有桶木黄岭，西北有巨大姑岭，东北有矗古阳寨，形成一个四周高、中间低的盆地和独立的地理单元。境内溪流众多，其中耶溪是新昌县内最大的河流。该河在流经县城后与锦江合流，最终汇入赣江—鄱阳湖水系。在明清时期，顺耶溪河而下是天宝乡通往县城以及外部世界的主要途径之一。^①在生计模式上，除了农业生产之外，纸张的生产和销售对天宝乡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早在宋代，天宝乡就有土纸生产。明清时期，天宝乡生产的土纸占宜丰全县总量之半。直至民国初期，宜丰的地方志仍是认为天宝乡“力农者少而游食者多，不若东南勤苦，贫富均俭而易足也”^②。

明清时期，天宝乡下辖第三十一都至三十六都，各都管有数个或十数个村落，其中三十三都内的辛会村即为本文所要讨论的墨庄刘氏家族聚居之所。据《墨庄刘氏堦下重修房谱》记载，宋光宗时期，时任大姑岭巡检司的刘椿“见天宝辛会形势颇胜，遂家焉”。刘椿生子一，名承全。承全生念，念生允迪，允迪生阳祖、阳可。阳祖生四子，分别为孟洪、仲洪、季和、季珍；阳可亦生四子，分别为季

① 《盐乘》卷一《疆域》，民国六年刊本，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448），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

② 《盐乘》卷一《疆域》，民国六年刊本。

铭、季昭、季华、季荣，“而子孙繁昌，实自兹始矣”。元明时期，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一些刘氏族人开始由辛会向外分居。如六世祖季和携子孙迁往新居，季荣与子孙迁往大楼，七世祖敬翁和子孙分居仓背，奇翁和文翁的子孙则分居塔下，八世祖彦谦同子孙迁居庙下，等等。至清中叶，这些迁居各地的刘氏分支，先后形成了新居、镇居、仓背、下房、塔下、上屋、大楼、庙下等房派^①，而各房内部又形成了为数不等的支派，从而使刘氏家族在组织结构上变得更为完善和复杂。

在房支不断增多的同时，刘氏家族在科举上也逐渐取得了巨大成功。据方志记载，明清两代，刘氏家族共产生了进士9名（其中明代1名，清代8名），举人100多名，以及为数众多的生员。在清前期，由于刘氏子弟中举者颇多，以致时有江西乡试“无刘不开榜”之说^②。这些拥有进士、举人及生员等各类科举功名的家族成员，构成了族内的士绅阶层，主导了各项家族事务的建设与管理，展开了修谱建祠等一系列的收族活动。据史料记载，刘氏族谱的编修始于元末的和翁公。至明永乐九年（1411），时任秋官主事的彦铭之子用实鉴于“宗族浩繁，年派辽远而谱不重修，恐遂紊乱”，与叔父彦伦重修了族谱。此后，在族中士元、士会、金峰、云溪等士绅的领导下，刘氏族谱先后多次得到重修，“迄盛朝乾隆乙亥庚子计八修矣”^③。此外，为了强化家族成员对大宗祠的认同，明隆庆二年（1568）的进士刘体道重修了开基祖刘椿及其夫人的坟墓，重建了大宗祠，制订了“天宝墨庄家约”，强调凡是刘氏子孙“宜念水源木本，无忘天经地义。尚有灭伦犯分，轻则绳以家法，重则送官究治”^④。

通过族谱的编纂和不断重修，以及大宗祠的重建，刘氏家族确立了一套用以界定族人社会身份、规范族人行为的准则，保证了在各房支力量日益凸显的情况下家族组织的整合与发展。尤为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刘氏家族不仅通过世系的建构，达到了与新喻墨庄刘氏在世系上的对接，还借助在纸张贸易中获取的商业利润，对整个村落的布局进行了整体的规划，新建了墨庄阁等众多具有文化象

① 《墨庄刘氏塔下重修房谱》卷四《本源总图》，民国五年刊本。

② 《新昌县志》卷七《选举志》，同治九年刊本。

③ 《墨庄刘氏塔下重修房谱》卷一《序》，民国五年刊本。

④ 《天宝墨庄家约》，《墨庄刘氏族谱》（残），道光十一年刊本。转引自刘飞华《资源、交通与家族变迁》，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征意义的建筑，完成了从天宝“辛会刘氏”到天宝“墨庄刘氏”的转变。^①至道光初年，刘氏家族在文献中自豪地宣称：“墨庄，吾望族也！新昌刘氏以十数而望墨庄者，无他族，其丁财文物，他族亦无及墨庄者，故墨庄在郡邑中赫然为诸刘首族。”^②

尽管刘氏家族在士绅的主导下，通过修谱建祠等各种方式，达到了对家族组织进行整合的目的，成为地方社会中的望族，但是我们也发现，自明后期以来，该家族内部出现了分化的趋势。如刘体道在重建大宗祠时就发现，族人对始祖刘椿之墓已有了“地势穷隔而疏旷者亦久矣”的现象，而进士刘大成主持的八修族谱活动，亦因为族内各种意见一时难以整合，最后历时二十五年才完成。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随着族内各房支发展程度的不一，刘氏家族自明代以来形成的编修族谱的传统，已经难以继续维持下去。而嘉庆朝以后各房支谱的出现，则是这种趋势的必然结果。

刘氏家族房谱的编修，发端于清中叶而滥于清后期。嘉庆十五年（1810），该族的堦下房鉴于族谱三十多年未修，而“每月登祠酌议，各房意见虽同，而计议方兴，尚待有因”，故纂修了本房的《兰玉集》。道光十一年（1831），刘氏家族第九次编修了族谱。不过，与此前历次族谱编修不同的是，这次族谱编修并不是一次性编修完毕，而是“商定各房先行纂就兰玉集，汇齐交祠”，然后由谱局统合而成。因此，刘氏九修族谱实际上是各房房谱（兰玉集）的合成。同治朝以后，编修房谱更是成为刘氏家族中的一种普遍现象，甚至出现了以支派为主的支谱。如同治《墨庄士元支谱》就说到：“吾族谱修有年，今欲重修，族大人繁，各持意见，恐一时不能遽协，不如纂集兰玉，留以待后之贤者，由分而复合，但事不宜延，择日兴工可也。”^③

族谱编修的不断受阻与各种房支谱的先后出现，反映了刘氏家族文献编修的重心，已由族谱转到房谱。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表面上看，其直接的动因是刘氏家族人口的增长和房支分化，即各房在编修房谱时所说的“族大人

① 有关此一问题，后文将做详细论述，此不赘述。

② 合族公撰《墨庄阁记》，《墨庄刘氏堦下重修房谱》卷八《艺文集》，民国五年刊本。

③ 《墨庄士元支谱》卷一《序》，同治六年刊本，谱藏国家图书馆。

繁，各持意见”。但是，如果我们做进一步的探究，不难发现在这种表象的背后，实际上是明后期以来刘氏族人的认同，逐渐由“大宗”转向“小宗”的结果。如该族的塔下房在初修《兰玉集》时就说到，“将来大宗重修谱牒，持此以付合编，亦较易也”^①。在第三次编修房谱时亦云：“族谱之修，既以族大人繁屡梗其议，而编辑房谱之事，断有亟亟而不可缓者也。”^②另外，从一些房谱编修的具体背景来看，清中叶以后刘氏家族中房谱的编修，还与族中商人阶层的出现及其在家族生活和地方事务中地位的抬升分不开。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墨庄刘氏塔下重修房谱》这一文献的产生过程中。

二 《墨庄刘氏塔下重修房谱》的编修及其文本的变化

如上所述，清中叶以后，随着房支的分化，房谱的编修逐渐成为刘氏家族中的一种普遍现象。那么，作为一种新出现的家族文献，房谱在文本上与族谱又有哪些联系和差别？时代的变化和编修者的身份又分别对房谱文本的构成产生了什么影响？等等，均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下面试以《墨庄刘氏塔下重修房谱》（下简称《房谱》）为例，对此做进一步分析。

我们现在所见的《房谱》为民国五年（1916）刊本，连同卷首在内共13卷，计16册。各卷具体内容分别是：卷首包括此次编修房谱的序言和各卷目录；卷一包括凡例、列祖考妣坟山图、房祖祠图以及历次房谱编修序言；卷二为刘氏历代本源世系和本源世系总图；卷三是肇基天宝墨庄世系总图和墨庄世系分图；卷四为合房世系分图；卷五为宸翰表，包括诰、勅；卷六为旌表录，包括忠臣、名宦、乡贤、义士、善士、节孝、百岁及五世同堂；卷七为阀阅汇，包括科第、恩荫、仕宦、援例、国学、文武庠、从九、掾职、乡饮、恩例和恩赐官带等各种功名和职衔；卷八为艺文集，收录各朝名宦大儒为刘氏及其族人所作的记文、墓志铭、寿序、诗序、传和诗歌；卷九为祀事纪，包括庙制、祭期、祭器、祭品和祭产等五类。卷十为义产志，记载该房中为祭祖、兴学以及其他事务设立的各种会

① 《庚午兰玉集序》，《墨庄刘氏塔下重修房谱》卷首《序》，民国五年刊本。

② 《墨庄塔下合修房谱序》，《墨庄刘氏塔下重修房谱》卷首《序》，民国五年刊本。

社及其产业；卷十一则包括房谱跋、领谱字号和新旧修谱时乐助的名单，以及修祠时捐款族人的名单；卷十二为各会根基，记载该房其他各种会社及其所置田产。这13卷又分成16册，其中卷首至卷四之一为第1册，卷四之二至卷四之十三分别各成1册，共13册，第14册则包括卷五、卷六、卷七以及卷八的记和志铭部分，第15册为卷八的寿序部分，第16册由卷八的诗序、传及诗歌部分和卷九至卷十二等组成。

据《房谱》的记载，它的编修是在该房二十二世孙刘嘉会的倡议和主持下完成的。嘉会谱名震兴，字元及，号礼丞，生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为优廪生。光绪十一年（1885），因监修瑞州府考棚，获加奖五品衔。光绪二十三年（1897），成岁贡，分发云南按察使司经历，署理昆明县分县，后调署鄂嘉州州判。^①民国四年冬，嘉会由云南任所归里后，倡议重修房谱，房下成员“群情踊跃，靡不乐而赞成之”，并当即推选出相关人员，议定先由各支拟定稿谱，交祠以总其成。次年四月，该房设谱局于房祖祠，将各支汇齐来的稿谱作统编，并由族人捐资将房谱刊印。^②

尽管《房谱》在名称上并没有显示出是几修，但从谱中的内容来看，应是堦下房第三次编修房谱的结果。有关该房前两次编修房谱的时间和经过，《房谱》中收录的、民国五年合房公撰的《墨庄堦下合修房谱序》有详细追述，兹引述如下：

我房谱牒之修，创于清嘉庆庚午之岁。是时距八修族谱仅三十年，而素园、石泉二公用是斤斤，尽出所贲而不恤，仁孝之心发于至性，非偶然也。迨咸丰丁巳，诸先达踵而行之，缕析条分，较诸庚午，前后辉映。然距族谱九修之时亦不过廿余年耳。今何如也？房谱未修已六十载，族则八十余年矣！此间之生葬未书，婚娶未书，旌表闾閭未书，捷指而莫能数。长此以往，保无杂还坠遗之虑乎？族谱之修，既以族大人繁屡梗其议，而修辑房谱之事，断有亟亟而不可缓者也。适于民国初年，礼丞先生自滇解组归田，言念及此，力倡重修。乙卯冬月，登祠提议，群情

① 《墨庄刘氏堦下重修房谱》卷四《世系分图之亦质守济支》，民国五年刊本。

② 《墨庄刘氏堦下重修房谱》卷首《序》，民国五年刊本。

踊跃，靡不乐而赞成之。公推办事十余人，议定先由各支拟定稿谱，限期交祠，以总其成。亦以采访易而成功速也。丙辰三月，稿谱既齐，而颍州一派又举执事而远至，要皆仁孝之心所见端也。于是諏定四月吉日告庙，就祠设局。捐貲者解囊不靳，襄事者竭力无遗。其专抡各编，矢公矢慎，毋紊毋淆，踵旧增新，弥罅补漏。未尽者必求其尽，未详者不厌其详。始事于夏，脱稿于秋，不数月而剞劂告成，易“兰玉”之名，扩而大之，曰“堦下房谱”。^①

由此可知，墨庄刘氏堦下房的房谱，初修于清嘉庆十五年（1810），继修于咸丰七年（1857），三修于民国五年。在历次编修过程中，房谱的结构和内容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由最后易“兰玉”之名为“堦下房谱”。由于未能得见《兰玉集》，《房谱》的内容有多少来自《兰玉集》不得而知，但是从《房谱》卷1至卷4和卷8中文本的类型及产生的时间来看，《房谱》的文本应是集合不同时代的族谱和《兰玉集》中的内容而成。

首先从卷1说起。该卷除收录前两次编修房谱和九修族谱的序言外，还有宋人刘永、刘敞，元人刘杰年，明人刘季鹏所作“刘氏得姓源流考”、“集贤公彭城考辨”、“杰年公考谱序”和“季鹏公墨庄辩”等4篇文章。从这些文章的内容来看，前3篇为房谱或族谱所作的序文，应是分别来自嘉庆和咸丰版《兰玉集》及九修族谱。后4篇由刘永等人所作的文章，最晚产生于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的文章，则有可能来自于此前刘氏家族的二修族谱。如《房谱》记载：“吾族旧谱自和翁公提其端，彦伦、用实、士元、士会诸公理其绪。”这里提到的和翁公与堦下房祖文翁公同辈，文翁公生于元延祐三年（1316），歿于元至正十四年（1354），因此和翁公应属元末之人，其初修的族谱中不可能收录明人的文章。又据《房谱》记载，彦伦生于明洪武七年（1374），其完成族谱的编修是在永乐九年（1411）。因此，有可能是在此次修谱时，将四文全部收入。不过，从对卷二、卷三的文本的分析来看，这些文章更可能迟至清乾隆年间才被编入族谱。

卷二和卷三包括本源世系、本源总图和合族系世总图三个部分。在本源总图

① 《墨庄堦下合修房谱序》，《墨庄刘氏堦下重修房谱》卷首《序》，民国五年刊本。

中，刘氏将新喻刘氏的始迁祖刘逊视为天宝的启源祖，而在本源世系中，又将刘逊以前世系全部建立起来，并上溯至西汉的楚元王交，从而使天宝、新喻、彭城三地的刘氏有了一个完整而分明的世系。但是，新喻墨庄刘氏的子孙、宋人刘敞在《先祖磨勘府君家传》却这样说：“刘氏之先出楚元王，世为彭城人。西晋末，避兵乱，迁江南。其后又迁庐陵，世次皆不明，不可得而知，然犹以彭城为望，自庐陵迁新喻者，曰逊。”^①可见，刘敞虽然也称自己为彭城之后，但对于刘逊之前的世系却不甚明了。因此，《房谱》中完整的世系图其实是天宝刘氏建构而成。那么刘氏家族究竟于何时完成了这种世系的建构呢？《房谱》收录的《墨庄刘氏九修族谱序》曾说道：“藉先贤参稽博考，而宗源昭晰无虑其略矣；由聚族见真闻确，而世系分明无虑其淆矣”。这说明最迟在该族乾隆四十六年的八修族谱中，就已经完成了与新喻墨庄刘氏（即宋人刘敞一族）的对接，并在此后通过建立“墨庄阁”等一系列家族文化建设，完成了由“辛会刘氏”向“墨庄刘氏”的转变。^②因此，上述4篇有关刘氏得姓与郡望的文章，极有可能是乾隆时期天宝刘氏在编修族谱之时将其收录，从而达到与世系图的建构相互呼应的目的。至于《房谱》中的这些文章与世系图是否为初次出现在房谱中，还是在此前的两部《兰玉集》中就已经收录，则有待于《兰玉集》的发现。

卷4为合房世系分图，由天宝各支的世系图、颍川支的世系图和皖北支的世系图三大部分组成。由《房谱》中“稿谱既齐，而颍川一派又举执事而远至”，以及“及迁徙皖北之支派莫不一一而记载之”等内容来看，颍川、皖北两支的世系在此前的《兰玉集》中并没有收录，而是在民国五年才编入《房谱》。至于《房谱》内天宝各个支派的世系图，应是糅合了《兰玉集》中的相应内容和各支的谱稿。

卷8艺文集成的文章，除“记文”和“寿序”两类外，其他几类产生的时间均没有晚于咸丰七年（1857），即该房第二次编修《兰玉集》的时间，这说明它们应是来自于咸丰版的《兰玉集》。在“记文”中，只有《房谱》主修者刘嘉会

① 刘敞《公是集》卷五十一《行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② 刘氏家族的这种转变，在不同时期的地方志中也能窥见一二。如康熙《新昌县志》中有关天宝刘氏家族的记载，均称其为“辛会刘氏”，而道光三年的《新昌县志》则开始冠以“墨庄刘氏”。

所作的《南轩书舍记》一文，产生的时间晚于咸丰七年，而这显然是刘嘉会主持编修《房谱》时所增加进去。如刘嘉会在文中就说：“七月房谱告成，已付剞劂，爰撰是记编次其中，以表公之遗迹云。”至于“寿序”中的文章，其实也是在咸丰版《兰玉集》基础上增编而成。因为从第一篇作于乾隆三十二年的文章，到道光五年的文章，乃是按照时间先后的顺序编排，而此后的文章则有先有后。造成这种结构的缘由，《房谱》中的一条凡例做了最好的注解。该条文云：“记、序、传、墓志铭，旧谱已录全文登载艺文者，仍之。以后惟忠孝节义受旌典及善行众著而名公为之传记者，呈稿核实，亦许登载。”换句话说，“寿序”中前半部分作于咸丰五年前的文章，在《兰玉集》中已登载，而后半部分文章中有的虽产生咸丰七年之前，但是《兰玉集》并没有收录，故而在三修房谱时要求登载，谱局在按照凡例中的标准核实后，将其与咸丰七年后的文章一同加入到《房谱》中。

另外，“记文”中合族作于道光八年的“墨庄阁记”一文，在道光十一年的九修族谱中有收录，^①这说明咸丰版《兰玉集》的文本，又吸纳了九修族谱的部分内容。而“序”中产生于永乐九年的两篇文章，均是时人为刘氏二修族谱所作，因而完全有可能初收于永乐版的族谱中，此后历次修谱再将它们编入。因此，我们所见《房谱》中“艺文集”，应是明前期以来族谱和房谱交替编修的结果。

尽管《房谱》的文本有不少来自族谱和《兰玉集》，但是与原来的文本相比，这些文本在世系成员的记述和各种封赠和科名的表述等诸方面均有了变化。如《凡例》说到：

是集生歿、配娶、嫡庶、继嗣、尊卑、爵秩，俱遵族谱，即间有未合而旧谱已载者，仍之。

旧谱于渎紊伦纪之辈，例以阴文黑圈示惩，兹从宽，仅缺其本身齿行歿葬。

旧谱纪庠生分郡邑，文载习经，后因公令士子普习五经，故不载习经，书廩、增、附为区别。旧谱曾载习经者，仍之。武庠生照旧分郡

^① 合族公撰《墨庄阁记》，《墨庄刘氏族谱》（残），道光十一年刊本。转引自刘飞华《资源、交通与家族变迁》，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邑。科第加载科目、名次。官职、恩荣援例各功名据实直书。各学校毕业照依凭单。

封赠凭诰勅本身实任随品级书诰授、勅授，封赠父母及祖父母，书以子孙某贵诰赠某地某职，捐封赠贵字换职字。命妇照品级书，有例得封赠未膺勅命者不录，旧谱已载者仍之。^①

另外，据《房谱》记载，该房的《兰玉集》曾经依据地方志的记载来确定房族成员的事迹。而民国五年编修房谱时，则“核办虚实，不尽凭志，以新志所载未尽传信，故分别书之”。而卷八“艺文集”中的“凌云塔记”一文，道光《新昌县志》亦有收录，其中原为“俱面膺圣朝封诰”的语句，《房谱》则将其改为“俱面膺封诰”，而删掉了“圣朝”两字，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文本生产过程中的时代变迁。

除受到房谱编修时代的影响外，编修者的身份也制约了《房谱》文本的形成。从前引文来看，堦下房初修《兰玉集》，乃是“素园、石泉二公用是斤斤，尽出所费而不恤”的结果，民国五年的《房谱》编修，则是刘嘉会极力倡导的结果。那么，这些在不同时期房谱编修的主导者又是什么身份呢？据《房谱》卷四《世系》记载，素园、石泉二人实为兄弟关系，谱名分别为瀛芳和浯芳，他们的父亲是该房十九世孙刘应份（朗窗公），刘应份与兄刘应葆（菴堂公）则是拥有巨资的商人。^②而刘嘉会（震兴）则为应葆第五子润芳之孙。换言之，应份、应葆二人派下的子孙在堦下房谱编修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看到“艺文集”中的文章，大部分都与这一支派的成员有关。如荣轩公为应葆、应份二人之父，松亭公则是荣轩公第六子，云阶公、黻亭公、藻园公三人为刘应葆之子，石泉公、素园公、秀圃公三人为刘应份之子，梦岩公为刘应葆三弟应俊之子，伯瑗公则是梦岩公子孙，等等。而刘嘉会则在《房谱》修成刊印之际，特作《南轩书舍记》，以表其父之遗迹，并将其收入房谱。

此外，由于该支派经济实力较强，自清中期以后先后有多人为房祠捐献了大量的祭产，并成立了众多的会社作为管理机构。有关该房祭产的数量，在《房谱》

① 《墨庄刘氏堦下重修房谱》卷一《凡例》，民国五年刊本。

② 《墨庄刘氏堦下重修房谱》卷八《艺文集》，民国五年刊本。